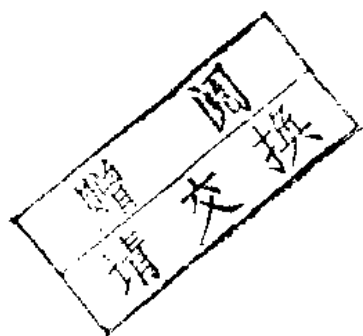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编者话

今年八月下旬，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给政协全国文史委主任会议的贺信中，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要继续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并指出：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李先念主席的指示，不仅充分肯定了文史资料工作，同时也指出了文史资料工作今后的奋斗方向。

认真贯彻李主席的指示和全国政协各省市文史委主任会议精神，首先要着重加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方面史料的征集和出版，同时，要加强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和交流，加强民族史料的征集，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这是在新形势下文史资料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深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

其次，在征集和出版工作中，要切实掌握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用翔实的史实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

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知识经验，并为团结联系各界爱国人士，为历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

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是文史资料工作一贯的方针，也是衡量文史资料价值的首要标志。所以，我们在组织撰写和出版文史资料工作中，一定要在存真、实事求是上下功夫，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辑所收入的内容，力求体现上述各项原则精神，但是，由于我们征集的史料还不够充分，加之编辑水平不高，差误、不当之处实属难免，敬请读者、知情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们恳切地希望，我盟各地政协组织、诸位政协委员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关心和大力支持盟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在李先念主席指示和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更好地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撰写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贡献。

巴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年12月

重要更正

因 2 7 6 页与 2 7 7 页颠倒，将七届政协副主席李辅臣等八位同志误排至六届政协副主席之中，应排在 2 7 7 页李克森布副主席之后即可。特此更正。

目 录

回忆我在巴盟的工作及巴盟行政机构的变动情况.....	杨力生 (1)
米仓县经济、教育工作概况忆述.....	王直科 撰稿
张启高、张世杰、田永旺 整理	(51)
解放前临河县永和乡农村经济情况见闻.....	刘熊飞 (107)
解放后巴盟农业生产发展概况的回顾.....	赵国兴 (117)
新中国农业税收政策之体验.....	李清 (151)
四十年代绥西汽车运输业片断.....	姜宝恕 (162)
解放前陕坝的货栈业.....	高德富、王廷英 (177)
巴盟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见闻.....	高德富、王廷英 (189)
巴盟政协大事记 (1955年 1月至1989年 7月)	王枝梅 整理 (214)

回忆我在巴盟的工作及巴盟 行政机构的变动情况

原巴盟盟委副书记 杨力生

(一) 写在前面

我于1949年11月1日到达原宁夏省磴口县，任中共磴口县委书记。1953年11月调任宁夏省阿拉善霍硕特旗蒙古自治区工委副书记。1954年原宁夏省建制撤销，划归甘肃省管辖，阿旗蒙古自治区随之改为甘肃省阿拉善霍硕特旗蒙古自治州。1956年，阿旗蒙古自治州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改名为巴彦淖尔盟。管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巴音浩特市(市建制以后被撤销)，我任盟委副书记。1958年，巴盟与河套行政区合并为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盟府由巴音浩特迁址三盛公，即现在的巴彦高勒。我先后任盟委副书记、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期。

我在巴盟住了18年。18年对1个人的一生来说，不是短暂的一瞬，而是较长的一段路程，巴

盟是我的第二故乡。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巴盟的人民群众对我情同手足，亲如家人。我和巴盟的各族干部与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着深厚的感情，巴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感到十分亲切。

巴盟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降伏黄龙，保护农田，筑起了308华里长的防风固沙林带；为驯服黄河，变水害为水利，筑起了百里防洪大堤；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繁荣美丽的巴彦淖尔盟。在这些伟大的壮举中，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记载。因此，我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它写出来，作为对巴盟人民的歌颂，同时也把它作为我对巴盟人民的怀念。

（二）踏上征途

1949年9月23日宁夏银川市和平解放，同年10月18日，中共宁夏省委派我和李尔直等32名干部前去接管磴口县。这32名同志都是从陕甘宁边区来的，都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也有对敌斗争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出发前，省委书记潘自力 and 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亲自召集我们开会，交代了任务，指出到磴口县工作的艰巨性，嘱咐我们一定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省委安排：我任

县委书记，李尔直任县长，其他30人都是各科室负责人，就连区级干部也明确了。我们由一个班武装保护，即日从银川市出发。当我们走到离磴口县还有200里的石咀山镇时，因前路被包贵廷土匪部队袭扰，行人断绝，情况不明，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只好在石咀山镇住了下来，一面派人侦察情况，一面组织干部学习、研究到磴口后开展工作的方案。为了防备土匪袭击，我们作了打仗的充分准备。大家找来了120个大皮浑筒，里边塞满羊毛，绑在木椽上，做成了漂水过河、乘风破浪的“土军舰”。同时还与驻在此地的19兵团194师取得联系，他们支援我们每人一身老羊皮皮袄还有30匹战马。

然而，在同志们的议论中，大家觉得土匪并不可怕，因我们一行人大都是当兵出身，又有武器，打仗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还想找寻土匪去消灭他呢！大家担心的是到磴口后如何开展工作。特别是听石咀山的老乡说，磴口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漠里刮起大风天昏地暗，寸步难行，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风卷进黄河里。还有的人说，那里刮起大风来，沙浪比城墙还高，扑向村庄，卷走牛羊，埋没房屋。我们对老乡们这些说法半信半疑。有的同志说沙漠如果真有那么厉害，那里早就无人居住了；有的说沙漠如不厉

害，怎么这里不见行人来往。总之谁也说不清，有的人不免情绪低落。县委委员、公安局长董怀月同志说他是陕北人，见过大沙漠，沙漠对人畜是有危害的，有时有破坏性，但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人类完全可以征服沙漠。他的话使一些情绪沮丧的同志振奋起来。我趁机鼓励大家：

“同志们，老董说得对，人类完全可以征服沙漠，我们也一定能征服磴口的沙漠”。从那以后，在我和同志们的脑海里就印下了如何治理沙漠的问题，为以后的防沙造林，封沙育草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30日，我们在石咀山镇已住了20天，在初步摸清情况后，决定整装起程。我们请从磴口来这里的郭秀礼等人作向导，乘“土军舰”沿黄河顺水而下。路上郭秀礼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磴口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状况。原来磴口县城（原址在今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是个风景独特的地方，黄河流抵县城脚下，城外的石头台阶逼使河水向东奔腾而去。乘船在黄河上向北眺望，磴口宛如一座小岛，沿河的杨柳、沙丘倒映水中，就如一幅动人的山水画。镇内房屋鳞次栉比，寺庙（清真寺、关帝庙）布局得当，素有小北京之称。这里又可称是水旱码头，平时河里千帆云集，镇上万驼往来，商贾贸易相

当繁华。镇内居住着汉、蒙、回等各族人民，他们有着各自的风俗习惯。郭秀礼等人悲痛地说：

“可惜这样好的地方，现在被土匪残害、糟踏得不成样子啦，磴口人民早就盼望你们来啊！”

11月1日下午，我们到达了磴口县城，下船入城，所见到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镇内房舍空荡，人畜无影，房屋门窗烧毁，残垣断壁，惨不忍睹。我们在县政府内看到的是纸灰满地，桌椅横卧，档案毁坏，不堪收拾。郭秀礼同志哭着向我们诉说：“这都是前些时包贵廷土匪部队糟害的结果，这些残无人道的家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将百姓财物抢劫一空，人们流离失所，无法生存，都到外面逃难去了”。

看着这一片惨象，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里已不能作为新的县政府所在地了，于是与县长李尔直同志商议后，席地而坐召开了县委会，讨论迁移县址问题。经两小时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向宁夏省委请示将县府由磴口迁到三盛公（后来省委批示同意把县址迁往三盛公，即现在磴口县粮台乡政府所在地）。

县委会议结束，我们又乘“土军舰”继续东行，约50里，至上江。此时天色已晚，船不宜行，我们只好在上江河面抛锚过夜。10月天气，塞外草衰，寒气逼人，但同志们睡在羊毛堆里也聊

以自慰。这一夜不许高声说话，不许点灯，吸烟要用手把烟头捂住，以防土匪袭击。我和李尔直同志睡在一个被窝里，他问我：“老杨，你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吗？”我说：“水中过夜还是第一次。”他又问我：“你说这样安全不安全？”我说：“敌人不一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他又说：“还是小心为好。”于是我们起来对周围情况又进行了巡视检查，安排两个战士持枪站岗，注视河岸。我同李尔直同志开玩笑说：“兵法有‘背水一战’，今夜我们是韩信还是马谡”。

这一夜风平浪静，我们睡得很香，安全地渡过了这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东方刚发亮，大家就醒了。我们将船靠岸，我派两名同志去神树湾与绥远起义部队联系，剩下的人上岸活动四肢，舒展身躯，呼吸新鲜空气，此时同志们心情感到特别舒畅。一会儿只见东方泛起了桔红色，一轮火红的太阳从千里山冉冉升起。遥望西边是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霞光照射在沙丘上，金光闪闪，十分壮观。波涛汹涌的黄河，由南自北，奔腾而下。两岸人烟稀少，只有几座破屋点缀。这两日行船，只是在稗子地见到过一片河柳，这片河柳约十华里长，宽只二、三百米，但却抵挡了流沙。有的地方树木稀少，流沙已侵入河床，不仅影响航运，而且给黄河下游人民带来了灾难。

只有神树湾有两株几丈高的胡杨树拔地而起，点缀着这一片荒漠。同志们指着那两株胡杨树说：“这两株树太少了，如有稗子地的河柳那么多，阎王鼻子的流沙就伸不进黄河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围绕着黄河、沙漠、植树、种草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仔细地听着，很受启发。是啊，同志们说得有道理，河边种树得天独厚，防沙护堤受益非浅。这时，县长李尔直同志说：“我们三边旧社会有位县长在沙漠里栽了很多的树，现在人们从树边走过，还在称赞那位县长的好处”。我说：“李县长，磴口县有这样大的沙漠，又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你应该比那位县长更高明，种更多的树，为后代造福！”李尔直同志笑着回敬我一句：“这就看党委书记的领导了。”

大约早上8点多钟，派去和起义部队联系的同志回来了，同来的还有起义部队杨守谦团长派来接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到杨团部吃了早饭。我们趁杨团长向驻在三盛公的320师师部请示的一段时间，到戚万银、黄交交等几户居民家里进行了访问。他们住的都是矮小的土房，进门上炕直不起腰，炕上没有铺盖，只有几件破烂羊皮，地上也没有什么家俱，只有一个锅台。问时回答说：“种地无权，放牧收税，就此茅屋一间，过光景谁还作长期打算。”我们对这些贫苦人民作了安慰，鼓

励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家致富。

午饭后，杨团长陪同我们乘马奔赴三盛公。马走在阎王鼻子的大沙丘上，马蹄陷入沙子里就象被吸住一样，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我问杨团长，骑兵在沙漠里怎么打仗，杨团长说，有“沙漠之舟”骆驼可乘。此时回头望去，沙丘连绵起伏，无边无际，连神树湾那两株高大的胡杨树也被湮没在一片沙海中了。

穿过阎王鼻子，进入柳拐，此处人称二十里柳子，绿柳成荫，另是一样世界。这里长着茂盛的芨芨草、白茨、河柳、红柳等，野兔欢蹦，雄鸡横飞，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二十里柳子，我们碰到了看守电话线路的刘工头（名叫刘柱），他独自住在一间小茅庵里。我问他：“沙漠里的电话线路好管吗？”刘工头叹了口气说：“唉！很不好管啊，一刮大风就倒霉了，不是电线被吹断，就是沙子埋没了电杆”。他的话启示了我对风和沙子关系的认识，风助沙威，沙借风势真是害人哪！过了二十里柳子，就踏上了河套大平原，这里便是古诗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也正是指的这里。我念小学时，课本里就有关于河套的课文。今天亲眼看到美丽可爱的河套大平原，使我不禁心旷神怡。

过了南粮台，三盛公城已隐约可见，扬鞭策马急行10里许，不觉已到三盛公城西。原起义县长李开荣率数十人正迎候在城门外，我们下马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辔入城，住在了西城区的乡公所。晚饭后，李尔直县长、张光祖民政科长到320师师部拜会了张副师长和958团郑团长。当晚我们召开了县委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主要是了解掌握情况，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参加会议的有杨力生、李尔直、董怀月、刘元和、李建章、张光祖、周培基等同志，由县委秘书林生荣同志作了记录。第2天中午，320师张副师长设宴招待我们。当日办理了接管手续，从此我们开始了磴口县的新的工作。

（三）情况复杂，环境恶劣，内部出现了动摇派。

磴口县地处我国西北和华北交通要道上，长期以来属阿拉善旗管辖。自民国15年12月设立磴口县起至解放前，统治西北的国民党马鸿逵旧政权和阿拉善旗王爷为争夺这块地方，发生多次激烈的斗争，旗县并存，矛盾重重。特别是连外国人也看中这块宝地，1875年外国传教士进入磴口后，磴口县几乎被教会控制。庚子赔款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势力瓜分土地，愚弄人民，三盛

公教堂成为西北的一大教区，号称“小梵蒂冈”。教会势力所到之地筑城建堡，搞武装，有地权，全县一半以上的地方成了他们的“包界”。于是出现了旗、县、教堂三权并存的局面。解放前夕，德穆楚克栋鲁普部下包贵廷土匪部队狼奔豕突，将磴口县城抢劫一空，人民遭难，生灵涂炭。使磴口县城这有名的平罗八景之一的“春帆重镇”变成了“枉死城”。起义县长李开荣带领全体旧职人员逃到了三盛公。我们到三盛公后，这里住有绥远刘万春起义部队的3个团。当时起义部队中还有人进行反共宣传活动，有人甚至在大街墙壁上画了一个5人，上边写×××三个字，有的还书写反动标语，诬蔑谩骂我党。为此事我曾专门找起义部队张副师长面谈过。以后，公开的反动宣传没有了，但是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家伙仍在暗地活动。天主教堂的神甫中也有坏人，有的曾在河北献县当过还乡团队长，华北解放后，混入教堂，他们利用传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当时驻守在三盛公教堂内的九五八团的贾营长（名字记不清了）很靠近我们，此人思想进步，曾多次与我面谈，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中有人暗地进行活动……”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不久贾营开到黄羊木头，就有两个连叛变了，与张疤子土匪结合起来上太阳庙山骚扰当地

人民。这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仅磴口县境内就有好几股土匪，他们与以图克木庙为中心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包贵廷匪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小股土匪，狐假虎威，借着包贵廷匪部的声势，四处抢劫，先后有21户群众被抢，6人被打伤。

记得有一天夜里，三盛公城内相当紧张。晚饭后得知包贵廷土匪部队当晚要进攻三盛公城，这时其他起义部队都离开了磴口县。城内只驻着九五八团贾营长的1个连，是贾营长为了保护我们县委而留下的。这个连的连长姓刘，是董其武的外甥，思想进步，为人精干，和我交情甚好。那天晚上他与我定了守城作战计划，我们把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部队守护城墙，县委武装守大修道院。我和他一起上阵指挥。指挥部设在城西北角的围墙里，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土匪作战。到半夜时有位同志过于紧张，枪走了火，土匪得知城中有备，没敢攻城，使城内居民受了一场虚惊。

土匪出没，环境险恶，要开展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这时县委内部有的人出现了动摇。以县委组织部长刘元和同志为首的几人认为，磴口县环境恶劣，不能开展工作，要县委率全体干部立即退回镇川，否则，干部会受到损失，不好向组织

交待。当时在我们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认为全国解放，革命成功，如果在这里牺牲很不值得，回避一时再来工作也不迟。产生了畏难和侥幸心理，他们同意刘元和的意见。这些同志对开展工作失去信心，他们的这种情绪被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所利用，有的搞反宣传，散布恐怖气氛，推波助澜，以致有些基本群众一时也不敢靠近我们，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

但是以董怀月为首的大多数同志意志是坚定的，他们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全国形势大好，西北大军压境，十九兵团占领了宁夏，绥远部队已经于“9·19”起义，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群众倾向我们。因此不能畏难退缩，不同意率干部回银川。在出现这两种分歧意见的情况下，我和李尔直坚决地支持了董怀月等同志，我们明确表示，绝不能后退，后退就是投降，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开展工作。由于县委坚定不移，使曾产生过动摇思想的同志都坚定起来，站在了县委一边。而刘元和与二区区委书记张云看到支持他们的人少了，便不再在会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却在背后散布消极情绪。县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提出要请假回家。经我们分析，认为如不给请假，他们有可能不辞而别，反而对党影响不好。为了争取他们，最后给他们准